

中国病

许宏 著

两性人格毒化了官场空气，真正的好人就会遭殃！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病

（1911—1949）





中国病

许宏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 国 病

许 宏 著

责任编辑：张自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9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6.25 插页：2

字数：41,000 印数：1——73,500

ISBN7—5404—0404—3

1·326 定价：1.10 元

目 录

第一篇 病态的现象

- | | | |
|---|--------|----|
| 1 | 在现象的背后 | 5 |
| 2 | 祸起萧墙 | 13 |
| 3 | 哲学奇观 | 20 |
| 4 | 虐待意识 | 25 |

第二篇 病态的官场文化

- | | | |
|---|---------------|----|
| 1 | 东方神秘主义 | 40 |
| 2 | 王私与党私：前所未闻的秘密 | 48 |
| 3 | 政治全能主义 | 55 |

第三篇 病态的人格模式

- | | | |
|---|----------|----|
| 1 | 东西方的差异 | 65 |
| 2 | 消极处世观 | 71 |
| 3 | 本我·自我·超我 | 76 |

第一篇

病态的现象

致力于变革的人们发现，并不是每一项有利于国民的新计划都可以在中国行得通的。有些新理论、新方法一旦散布到社会中去，它们不但没有具体的收获，反而常常被强大的传统所吸附，结果变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

在西方卓有成效的奖金制度在中国就演变出了新一轮平均主义……

在日本令人感到亲切、温暖的家族主义在中国就强化了宗派势力……

尊重知识分子的观念在中国就导致了学历至上……

官员任期制在中国就转化成了“轮流坐庄制”……

分权管理体制在中国就引出了“政出多门”的社会问题……

……

总之，人们有一个普遍的感觉：不变革不行，但又担心出现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反复折腾的局面。

在一切领域，新思潮的冲击波以爆发性的力量不断摇撼着体制的丛林，使许多枯枝败叶随风落地，凄凄飘零。然而，落下来的东西还是被传统文化的土壤所吸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转而复生。

使人们产生普遍感觉的那个“担心”是有道理的，因为大家都能毫不费力地在现实里找到并不鲜见的例证。

人都有一种渴望变革的激情，同时却不愿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但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他既是一个主张变革的鼓动家或坚定的追随者，但同时又是一个顽固的守旧主义者修正派，这是因为他患了“中国病”的缘故，他心灵深处的文化沉积物使他铸成了自相矛盾的两性人格。他的阳性人格是向社会公开的，属于社会所有，所以他主张变革；他的阴性人格是高度隐蔽的，只属于个人所有，所以他阻碍变革。

并非人的个人利益都属黑暗之物，关键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承认它的存在，并认为它会损害自己阳性人格的光辉。人格的双重性，使人们时刻处于谨小慎微的状态，这首先就使人格的完整性遭到了破坏，并造成了人际关

系的复杂化和心理动机的不透明。

1 在现象的背后

秘书小李是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机关里来工作的，他使人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办事认真，性格内向的知识分子。他的上司却不知道，小李今天闷闷不解。

昨天他陪同上司出席了一个高级会议，由上级部门在会上布置了关于对一个重要的工业工程给予全面支持的方案。小李对自己上司在会上的发言作了认真记录，那是一篇精彩的演讲式的表态，说明上司对那项工程全力支持的决心。可是今天，上司召开“内阁会议”时，却来了个自我颠倒。他告诫下属们，不能把自己的预留钢材往别处调拨，也不能放弃增加供电的计划……

小李始而不解，后来联想到了“权术”这个概念，但最终还是明白了，这并非权术（权术比这高明得多），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即两性人格的表现。

绝大多数人之表里不一，并非心怀恶意。相反，搞两面手法是出于善愿和自卫的需要。

人们在公开场合总是不愿意表露自己内心的利益欲

望，而必须用符合道德标准的言辞作包装。所以，公开表达时最能体现人的阳性人格。

而在私下场合（如夫妻之间、亲友之间），就可以不加修饰地袒露心迹，与个人利益有关的问题、牢骚话等等，都能表达人的阴性人格。

凡是有事业心的人，大都有强烈的成名欲和利益要求。但这些个人抱负一旦公开就会遭到冷遇，所以大家都学会了讲套话、大话，做冠冕堂皇的阳性人。仿佛是一种社会化的默契：你尽可以那样想，但不要说出来，否则我就不好接受了。

电影明星对观众说：“为繁荣电影艺术事业贡献自己的青春。”于是掌声大作。但若说：“我要当世界级的明星！”大家就会假装没听见。

假如经理说：“这个职务困难多，责任大，容易得罪人”云云，那么，这个职务十有八九是掌握实权的显要位置，受任者便会理直气壮地领命，请你放心，经理绝对不会说这个职务是肥缺。

这是一个巨大的心理迷宫，无形、无色、无声。谁也不解其意，但大家都心照不宣。

在宴席的餐桌上，大家坐在一起便有了交情。按照礼仪之邦的传统，主人当然要客气大方才对。注意，主人开始敬酒了，一杯，两杯；客人还礼，一杯，两杯；

互相敬酒，一杯，两杯……然而，中国人并非个个都是海量，况且酗酒伤身，所以有些人开始推辞谦让了。先是迭声说“不行不行”，尔后以种种真假难辨的理由谢绝，诸如伤风感冒未愈、头晕怕吐、尚有公务在身之类……但是，除了汽车司机之外谁都感到盛情难却。不过，敬酒者这时已经不大注意文雅了，他动手拉扯你的衣襟，他要跟你打赌，他以各种巧妙的方法逼迫你。你呢，由于长时间地陪笑脸，因笑肌疲劳而露出了尴尬的脸色。这就是中国式酒席上的客气法，叫你难堪又必须笑脸相待。

在公共汽车或地铁车站上，大家互不相识，这就不必象酒席上那么客气了。车刚进站，“哄”地一声，人们蜂拥而上，把“礼让”二字忘个精光……

喝酒与乘车，本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但是，比较人在两种环境中的表现，人的两性人格就突出、放大起来了。原来，所谓客气，是做给熟人看的，其心理动机是一种人情价值观念，亦即人际关系上的功利主义。

自孔夫子以来，中国所受的道德教育就是“克己”、“礼让”，奉行“和为贵”的消极处世观，既如此，为何有“内斗”的历史恶习呢？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行一统化的政治纲领，并且不惜封闭国门以实现域内的

安定，可是为何中国历史上竟内战连绵、党争不绝呢？

原来，中国人的所谓一团和气、大一统政治，都是阳性人格做成的表面文章，而内心却是用阴性人格在思考问题的。

当别人承诺你提出的要求时，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正如一位台湾学者所说，对于选举问题，西洋人的作风是：“我是最合适的，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谦虚，即令有人要选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哪里够资格？”其实你若没有选他，他会恨你一辈子。

中国人与人相处就须十分小心了，要善于察言观色，领悟别人的话外音，而不能过份相信自己的直觉。为了防范小人，以免砸了自己，于是大家逐渐掌握了一套很有应用价值的“会议语言”——在会议或其他公开场合向大家表白的语言，其特点是谦虚、圆滑、空泛。

谦虚的如：我是来学习、取经的；抛砖引玉；难免有错，敬请指教；等等，其作用是避免人家说你自负、骄傲，且可做免战牌之用。

圆滑的如：虽然……但是；一分为二；原则上同意；等等，其作用是避免任何可能的偏颇，把思想锋芒藏起来，叫人抓不到话柄。

空泛的如：形势大好，成绩是主要的；争取更大的胜利；等等，其作用是掩饰自己，蒙蔽别人。或许他对事物毫无感性认识，只是为了支撑门面而已。

在会议上，只要有不同意见，空气顿时就紧张起来，发言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两个观点对立者在那里接受目光的审判。若有一个善于调处矛盾的人从中归纳观点，才有和平的结局，否则争论者从此之后就怀恨在心了。

但更多的会议总是意见高度一致的，尤其表决性的会议，进行到表决程序时，很多人心跳加速，血压升高，他们不露声色地审度局势，然后若有所失地慢慢举起手来，加入到“百分之百”的行列。

很多人掌握了这样的诀窍：要评上“先进”就只要争取提名，因为在评比会上谁也不愿当面说你不夠资格。所以，哪怕明明是一位差劲的候选人，最终也能获得全部赞成票。当然，事后又免不了一场背地议论，因为人们投了一张违心的赞成票，总要发泄发泄心里的积怨。如果出现了“名额有限”的情况，那就只好另外召开秘密会议去解决“平衡”问题了。

由于两性人格的存在，中国人的谦虚品质便有了无限的外延，以至虚伪。假设你的公司招聘一名女秘书，你问应考人“是否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她说：“我经验不

足，还要锻炼提高”。那么你就弄不清她究竟是真的阅历不足还是一种谦虚的姿态。

谦虚是为了体现一种广泛的品德，同时又能使自己获得一种容易受到同情的人际地位。长期的道德压迫和人身管制使中国人养成了憎恨强者、同情弱者的思维定势，这也是一种逆反心理。假设有两个人发生冲突，围观者支持哪一方呢？要这样决定：看两人的身份而同情低贱的；看两人的年龄而同情年老（或年幼）的；看两人的性别而同情女的；看两人的态度而同情胆小的；若有一方哭起来了，那必定得到广泛同情而无疑。

这种思维定势不仅表现在人际关系方面，在经济方面也有许多派生物。中国历来重农轻商，因为种田人老实、懦弱、贫穷；商人机智、敢冒风险、生活富裕。结果人们把商人当作寄生虫看待，而不认为经商是一种正当的职业。

西方国家的银行，乐意与经济实力强的企业合作，经营不善的企业信誉就成问题了。所以企业经理在银行老板面前都喜欢吹嘘自己。中国的情况刚好相反，企业经理总爱向银行诉苦，尽量强调困难，以此获得银行的同情——然后得到贷款。

许多企业到了年终就在想办法瞒报产量和利润，因

为有些经济政策是要鞭打快牛，扶持落后，效益好的企业第二年负担更重，效益差的企业反而容易得到税收等方面的照顾。

有人说，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难就难在要具备彻底而娴熟的两性人格。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就要充分表现自己的能量；而要被社会环境所接受就要尽量掩盖自己的能量。这需要高超的平衡能力才能做到。许多专注于事业的人往往忽视了这个问题，所以日子远不如庸人过得舒服。

但是，我们对这种事实并不在意，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都有两性人格。习惯成自然。

据说清朝大臣李鸿章出访美国，在一家大饭馆宴请美方官员时，照例说了几句表示谦虚的开场白：“今天承蒙各位光临，非常荣幸。我们略备粗食，聊表寸心，没有什么可口的东西，不成敬意，请多多包涵……”第二天，当地报纸照译成英文刊登出来，饭馆的老板大为恼火，要求这位李中堂大人赔礼道歉，李鸿章这才知道自己损害了饭馆的声誉。倘若确有其事的话，中国的“谦虚”早已闻名世界了。

两性人格成为人们的共同品质之后，你就感受不到它的病态了，这就是最大的悲哀。我们生活在荒诞的不



境里，每天都在做着荒诞的事情，但心里却没有荒诞感。相反，很多时候我们浑身充满了神圣感。这种情绪常常能在人群中产生一种愚昧的力量，甚至可以摧毁文明，颠倒理智。

现在，改革的浪潮一阵一阵地卷过中国大地。但是，至今还有很多人弄不明白：面对患浮肿病的机构人人都气愤不已，但大家都把自己看作能上不能下的终身官；每项改革政策都获得了一致通过，每一个口号都那样深入人心，广泛流传，可是执行起来却阻力重重，矛盾四起。即令最近几年，我们仍然看到了两性人格的充分表演：“整党”工作做得最认真的地方，经济工作却倍受掣肘，供销人员不愿去那里参加订货会，上级部门不愿去那里搞调查研究，本应供给那里的计划物资却向别处调拨……

这里要提请读者们注意，我们自受已久的形式主义枷锁便是由两性人格制造出来的。自我拔高的宣传，不问实效的管理，弄虚作假的自欺行为，把自己忙得一塌糊涂，只是为了做给上级看，去迎合上级的阳性人格。而阴性人格是不会在办公室里表现出来的，要房子、要待遇的事情只能搞个别汇报，对上门求援者说：“到我家里去谈。”

也许有些读者感到受不了了。任何秘密都经不起放